

INTERPRETATION

CLASSIC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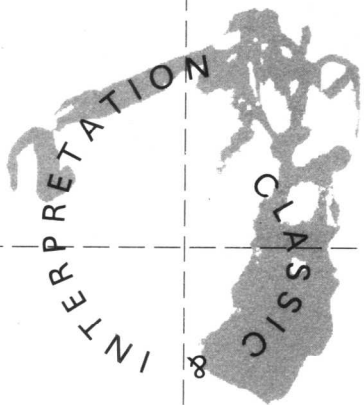
回想托克维尔

林国基 地理之于美国民主的利与弊
劳·乐 托克维尔论社会主义与历史
迈 尔 卢梭论哲学生活
刘 异 孟子《春秋》说微

华夏出版社

经典与解释(11)

■ 主编 / 刘小枫 陈少明



回想托克维尔

——纪念托克维尔诞辰两百周年

华夏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回想托克维尔/刘小枫,陈少明主编.

—北京:华夏出版社,2006.1

(经典与解释)

ISBN 7-5080-3940-8

I.回… II.①刘… ②陈… III.托克维尔(1805~1859)—
纪念文集 IV.K835.655.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5)第 156492 号

回想托克维尔

刘小枫 陈少明 主编

出版发行:华夏出版社

(北京市东直门外香河园北里4号 邮编:100028)

经 销:新华书店

印 刷:北京圣瑞伦印刷厂

版 次:2006年1月北京第1版

2006年1月北京第1次印刷

开 本:880×1230 1/32 开

印 张:10.125

字 数:270千字

定 价:27.00元

本版图书凡印刷、装订错误,可及时向我社发行部调换

目 录

论题:回想托克维尔

- 2 地理之于美国民主的利与弊 林国基
- 28 限度、自由和公共德性 崇 明
- 57 托克维尔两题议 林国荣
- 86 托克维尔的新政治科学
..... 曼斯菲尔德/温斯诺普(王利译)
- 111 托克维尔的视角 赫尼斯(韩锐译)
- 143 托克维尔论社会主义与历史 劳 乐(韩锐译)
- 167 托克维尔论性道德 凯斯勒(韩锐译)

古典作品研究

- 186 卢梭论哲学生活 迈尔(朱雁冰译)

思想史发微

- 218 邹衍遗说考(下篇) 王梦鸥

旧文新刊

- 282 孟子《春秋》说微 刘 异

书评

- 309 “知足之足常足”:伊壁鸠鲁的认知疗法 张新樟

(本辑主编助理:张丰乾 黄群)

论题 回想托克维尔

地理之于美国民主的利与弊*

——兼论联邦党人之美国例外论的神学-政治论题

林国基

引言

古典时代,地理习惯上划归运气或命运的范畴,与战争的关系至为密切,归神掌管;^①而民主则是现代人“深思熟虑和自由选择”的集体功业,归人掌管。^②地理与民主之论题由此是一个神学-政治(Theologico - Political)^③的论题,而不是地缘政治(Geo - political)的

* 题记:这篇纪念托克维尔的文章是在林国华的催逼下写成的。在此感谢所有逼我写东西的人。有诗云:如果你是我的好兄弟,那么就逼我写东西,我有一大堆东西等着往外挤。

① 在这个论题上作出重要贡献的有希罗德德、修昔底德、斯特拉波、马基雅维利、孟德斯鸠、波丹、格劳修斯等等。

② 指的是由英国人霍布斯和洛克倡导而由英裔美国人首次付诸实践的社会契约的政治观念。

③ “神学-政治论”这一论题由犹太政治思想家斯宾诺莎首创,是犹太人试图安全而体面地在现代世界予以安顿的秘密门径,它对犹太人的“选民”观念乃至犹太人的生活方式和感知结构都进行了根本调整。在此意义上,斯宾诺莎之于犹太人的功绩堪比犹太人的先知摩西。20世纪的犹太著名政治哲学家施特劳斯重检这一论题并将其发扬光大,可谓意味深长。

论题^①。

1492年,随着美洲的偶然发现,人类进入了所谓的“哥伦布时代”(the Columbian Era),^②或者说大航海时代,古代世界那个以陆地为中心的封闭的宇宙秩序随之被撕开,地球上的各个地理实体和实力中心命定被海洋结为一体,它们彼此之间或交通或战争,宇宙秩序随之重新塑造和奠基。从此,游历新大陆者如过江之鲫,绵延不绝。淘金的,占地的,避难的,传教的,建国的,林林总总。于是,关于美洲的游记或考察报告一时间大有泛滥成灾之感。比如,德国人拉采尔(Friedrich Ratzel, 1844 - 1904)就游历过美利坚合众国,美国“生存空间”之大成

^① 地缘政治学基本上是德国人的土特产,从 Adam Heinrich Dietrich von Buelow (1757 - 1807) 的《现代战争的精神》,Friedrich List (1789 - 1846) 的《政治经济学的国民体系》,Friedrich Ratzel (1844 - 1904) 的《政治地理学》,Karl Haushofer (1869 - 1946) 的《太平洋的地缘政治》和《边界的地理和政治涵义》以及他在慕尼黑大学创办的著名的《地缘政治杂志》,最后到 Carl Schmitt (1888 - 1985) 的《欧洲公法之国际法中的大地法》和《国家主权和自由的海洋》(参《陆地与海洋:施米特文集》,林国基选编并翻译,“海国图志”丛书第二辑,上海三联,即出)等,形成了一个颇为可观的大传统。对德国人而言,地理知识的普及和教育乃是最高贵的公民教育,在他们看来,大凡人文、社科的所有门类均可以冠以“地缘”(Geo-)这一称谓。第三帝国时代的地理学、地质学和考古学界甚至承担了为德意志民族奠基的高贵使命。为此,他们到处掘地三尺,从小亚细亚到传统的赫拉克勒斯之柱,从遥远的北冰洋到撒哈拉沙漠以北,企图将他们的民族之根植入土地的深处。身处内陆的德国人虽然的确也在深深地渴望着海洋,而且对于海洋的反思似乎比任何其他民族都要富于行而上高度,但他们实际上并不愿意真正将海洋或水元素纳入德意志民族的生存元素之中。尽管美国的海权之父马汉的《海权之于历史的影响》一百年前就翻译成了德语且在朝野引起过巨大反响,尽管他们也曾经有过一支威名显赫的德意志帝国海军及其冠以“永恒者”(The Eternal)美名的海上战神特皮茨(Alfred von Tirpitz, 1849 - 1930),但德意志人并不懂得海洋为何物。依古希腊四元素的宇宙论标准来衡量,德意志民族极端缺水,致使其宇宙秩序严重失衡,不和谐,此即前苏格拉底哲人所谓的“不正义”,或者说不受神的眷顾。

^② 参英国地缘政治学大家麦金德(Sir Halford Mackinder, 1861 - 1947)的著名论文《历史的地理枢纽》,第一页第一段。尼采也不得不将自己称为“新哥伦布”,然而,除了幽深闭塞的日尔曼森林以及林中空地上残留的贵族时代的尸骨和鬼火,他没有发现任何有价值的东西,因为该发现的都发现了,太阳底下再也没有新东西;该逝去的也都逝去了,宇宙中再也没有永恒轮回。况且,他所谓的发现乃是借助“气”这种最轻浮且暧昧的元素,而哥伦布借助的则是水这一最卑微且厚重的元素。对于尼采自嘲为“新哥伦布”的尖刻评论,可参犹太政治思想家勒维特(Karl Loewith, 1897 - 1973)的名著《尼采的同一者永恒轮回哲学》(Nietzsches Philosophie der Ewigen Wiederkehr des Gleichen)中的相关论述。

为其游历报告《政治地理学》挥之不去的巨大阴影。其报告单调枯燥,充满了地理决定论的宿命感,在他的笔下,人像蚂蚁一般匍匐在陆地上,成群成群地互相撕咬,虽不体面,却颇为实在。而另一位考察者的报告却要丰富得多,充满了海陆空三维之立体感和平衡感,那就是法国政治思想家托克维尔的《论美国的民主》。

当托克维尔谈到有助于美国维护民主共和制度的三个主要原因时,他列举的第一个原因就是“上帝为美国人安排的独特的、幸运的地理环境”。^① 遵循其师孟德斯鸠的古典史学传统,托克维尔赋予地理因素以显著的重要性,《论美国的民主》开篇就讲美洲和美国的地理。在他看来,美洲这一地理发现本身乃是一个纯粹的“运气”,或者说是某种“神意”。如果说人们习惯上将地理这一因素划归命运和神意这一神秘且神圣的范畴,那么,十分显然的是,托克维尔赋予了美洲尤其是美国某种天命色彩,把美洲的发现与旧约的《创世记》乃至那场担负着第二次创世使命的大洪水联系在了一起。贤明的洛克就曾模仿圣经创世论的口气说:“太初有美洲”,^②而托克维尔的描述更是质朴动人,颇有旧约《圣经·创世记》的古风:^③

当创世主赐给人们以大地的时候,大地上是人稀而物丰,取之不尽,用之不竭。但是,人们没有能力和知识去利用大地。当人们学会开发大地的宝藏而获得好处时,大地上已经到处是人。不久,人们便不得不为获得在一个地方居住和自由生息的权利而互相厮杀。

正在这个时候,北美被发现了。它好像是一直被上帝保藏着,而现在才从洪水中露出水面的。

当它出现于人们面前的时候,仍保留着创世之初的面貌,上面是一条条源头永不枯竭的河流,一块块湿润青葱的绿野,一片

① 托克维尔,《论美国的民主》,前揭上卷第二部分第九章。

② 洛克,《政府论》,Peter Laslett 编,剑桥大学出版社,1988年,下篇,第49段开头第一句,第301页。

③ 托克维尔,《论美国的民主》,前揭,上卷第二部分第九章。

片没有触过犁铧的无边无际的土地。

托克维尔在行文中处处把旧大陆与经由海洋而重生的新大陆相比,将旧大陆上日薄西山的贵族制与新大陆上生气勃勃的民主制相较。托克维尔认为,地理的特殊优越性是建立和保持美国的民主制的重要因素,但他并不认为地理是最重要的因素。在有助于美国民主制的建立和保持的三种重要因素中,民情最为重要,立法次之,地理的因素最轻。然而,关于地理在美国民主的建立和维持中到底占有何种重要性,托克维尔的论述似乎显得不够清晰,甚至是前后矛盾,至少是不够充分。因为,即使是在法治和民情这两个环节,地理仍然发挥着举足轻重的影响和作用。比如,就法治这个环节而论,托克维尔在逐一论述了美国的乡镇自治和州的政治制度之后,最后谈到了联邦制这个美国民主政治的“第一因”。他认为,美国联邦制“几乎完全建立在法律的假设之上”,简直就是“一个理想国”,它的建立和保持“主要应当归功于国家的地理环境”。紧接着他就谈到了战争,说战争能使政府的弱点暴露得最为清晰和触目。他认为,美国的联邦制有着固有的缺陷和软弱,经不起战争的考验,它之所以没有毁于一场大战,实在是拜优越的地理条件之赐。在这些优越的地理条件中,最重要的有两点,其一,国土的东西两侧是海洋,这一自然的疆界像天然的屏障使得美国与其他大陆隔开;其二,与美国在陆地接壤的国家不多,且没有强邻。于是,托克维尔这样总结道:“因此,美国的大幸并不在于它有一部可以使它顶得住大战的联邦宪法,而在于它处在一个不会使它害怕战争发生的地理位置”。^①

托克维尔似乎认为,美国的联邦制是由于地理这一“偶然的”或“天赐的”属于“运气”成分的护佑,才没有成为各种“强力”尤其是战争的牺牲品。或许在他看来,联邦制本身似乎是经不起现实种种“运气和强力”检验的奢侈品,尤其是当它应付可怕的战争时。然而,如果我们稍稍留心一下以汉米尔顿为代表的美国联邦党人对联邦制的

^① 托克维尔,《论美国的民主》,第1部分第8章。

著名解释和辩护,我们就会发现,托克维尔的上述判断是有失公允的。

在《联邦党人文集》第一篇的第一段,汉米尔顿无比简洁有力地提出了所谓的美利坚问题,或者说美国的例外论(American Exceptionalism):

时常有人指出,似乎有下面的重要问题留待我国人民用他们的行为和范例来求得解决:人类社会是否真正能够通过深思熟虑和自由选择来建立一个良好的政府,还是他们永远注定要靠运气和强力来决定他们的政治组织。^①

汉米尔顿认为,“运气和强力”乃是历史的常态,而美帝国试图成为一个例外。如果说人们习惯上将“运气和强力”划归神意或命运这一神秘且神圣之域掌管,那么,美国的例外论表达的则是一种不甘神意或命运掌控的去神圣化的努力。在此意义上,这同样是一种政教分离的尝试。它表达的是这样一种建立在常识感基础之上的政治自信:一个民族凭借人自身的“深思熟虑和自由选择”(建立在意见或同意基础上的社会契约),可以征服“运气和强力”的近乎神圣的盲目役使和摆布。与其相比,其他形形色色的政治主张和理想无一例外地沉溺于“运气和强力”的盲目役使和摆布之中。正是在这种渎神的政治命题中,联邦党人的例外论表达了征服命运的政治冲动和自信,显示出了试图超越古代世界的“诸神之争”的普世冲动,从而表达了比异教罗马的陆地性帝国更加强烈的基督教的海洋帝国的冲动。^② 在以汉米

^① 汉米尔顿等,《联邦党人文集》,第1篇第1段,北京,商务印书馆,1997年。

^② 关于美帝国的基督教起源及其通过社会契约与海洋的政治联姻,当“五月花号公约”莫属,其中所体现的社会契约的政治观念比霍布斯和洛克的社会契约论还要早。从社会契约论的原型五月花号公约,我们能够发现社会契约论的真正旨趣和美帝国的最后秘密,参林国基,《〈联邦党人文集〉释义:一项古希腊四元素的解释》,第二章“上帝城”以及第三章“大洋国”,“海国图志”丛书(第三辑),上海三联即出。亦参托克维尔在《论美国的民主》中依据当时广为传播的默顿的《新英格兰回忆录》对相关主题的记述,虽然这个回忆录还不是最具价值的文献。关于社会契约论与基督教之间在思想和精神气质方面的的隐秘联系,参笔者对此问题具有范式意义的初步研究(林国基,《神义论语境中的社会契约论传统》,上海三联 & 华东师大出版社,2005年4月)。

尔顿为代表的联邦党人看来,上述问题不仅仅是美利坚的问题,而且也是人类和历史的普遍问题。由于在美国之前还从没有任何一个政体能够解决这个问题,所以在美国联邦党人看来,这个问题的解决与否不仅关乎着“一个在许多方面可以说是世界上最引人注目的帝国的命运”,^①而且也关乎整个人类的命运。

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我们可以说,汉米尔顿将军的美国例外论乃是例外论的最经典、最深刻的唯一表达,它显露出一种无比强烈的普世性的帝国冲动和雄心;与之相比,迄今为止的其他的种种所谓例外论,皆是特殊论(Localism 或 Particularism)的变种^②,是文人的羸弱病态之象,不思进取之饰,矫情煽惑之辞。它们毫无例外地沉溺于“运气和强力”的神龛和魔咒之中而不愿自拔,而非不能自拔。

① 汉米尔顿等,《联邦党人文集》,第一篇第一段。

② 最有名但结局也最悲惨的就是犹太人的“选民”观念,这也是其他一切例外论(实际上都是各国文人们鼓捣出来的特殊论的变种,其内涵和气象与美帝国的“例外论”相差十万八千里)的原型和灵感,与美国联邦党人的“例外论”根本是两码事,尽管美国“例外论”与犹太的“选民”观有着非常密切的联系,比如,五月花号的美洲之行就被称为新的“出埃及记”。但犹太人穿越的蓝海岂能与“五月花号”上的朝圣客们穿越的大西洋相比?摩西从何烈山上取下来的法版岂能与那个诞生于汪洋上的一条船上的“五月花号公约”相较?几千年来,犹太人也一直被一种弱者所特有的苦大仇深感、怨恨感以及虚幻的优越感所折磨。最终,在被其他民族折腾了几千年后,他们还是迷途知返,在小亚细亚一块不毛之地上建了一个弹丸之国,总算保留了最后一点常识感,没有被他们的神搞得完全神经错乱。一个健全强悍的民族乃是一个和谐整齐的宇宙,这个宇宙能够容纳和统治“水、土、气、火”四种元素,且错落有序,互为交通。而犹太民族只拥有“气”元素(无怪乎犹太人盛产思想家!),而且畸形发展。其症结和病象是:这个民族存在着一个颠三倒四(神秘兮兮,高不成低不就)缺乏常识感的以“气”为生的贵族性的教士阶层,这个阶层阻断了政治(火元素或以太)与大地的(包括最卑微但也最厚重的土元素与水元素)的交通和循环,使其无法拥有一个坚实且宽广的统治基础,致使整个犹太民族变得头重脚轻,神经失常,群魔乱舞,常识感荡然无存,见到UFO或者龙卷风所成的沙柱,就尊其为他们的上帝,还跟着它们在沙漠里瞎转悠。在医学上,此种病象乃所谓的“气滞”(另参本书17页注①)。关于上述犹太人的所谓“例外论”及其施之于以色列国家安全战略的病态的深刻影响,参 Gil Merom,《以色列的国家安全以及例外论的神话》(Israel's National Security and the Myth of Exceptionalism), Political Science Quarterly, Vol. 114, No. 3 (Autumn, 1999), 页 409 - 434。

有限中的无限^①：联邦党人的战争视野

美利坚的问题能否解决,美帝国的例外论能否成立,在联邦党人看来,恐怕首先还要对人世间的“运气和强力”^②这一普遍的且根本的问题进行一番深刻的检讨。汉米尔顿认为:

总是单纯用法律的力量进行统治的思想(我们听说这是共和政体唯一允许的原则),除了存在于那些自命聪明、不屑汲取经验教训的政治学者的幻想之中以外,是根本不存在的。^③

为此,联邦党人尤其是汉米尔顿不得不将《联邦党人文集》85 篇中的至少一半篇幅用来回顾和讨论历史上的“运气和强力”问题,尤其是战争问题。因为,毫无疑问,战争是“运气和强力”的最高表达样式,它近乎神圣。

1787 年费城制宪会议之前,联邦党人和反联邦党人面临的一个共同问题是,“目前的邦联政府不足以维持联合”,存在着“主权中的主权”这一政治怪胎,邦联的软弱涣散状态使得新大陆随时有可能堕入

① 有限中的无限是前苏格拉底哲人、爱利亚学派的芝诺提出的著名论题。

② 联邦党人所谓的“运气和强力”就是霍布斯等人所提出的社会契约论中的著名假定“自然状态”。“自然状态”这一构建海洋帝国的假定和起点(在英国人霍布斯和洛克那里)曾备受包括卢梭在内的各路政治思想家的质疑和攻击,以至于它在卢梭那里开始被予以历史主义的处理(参其《人类不平等的起源》),从而开始走向陆地化,蜕变成一种小国寡民的政治理想,其蓝本即是他心目中的理想政体——日内瓦小共和国。问题是,这种小国寡民的古典共和理想只适合在小邦实施,在大国就会造成一系列严重的问题。大国如何解决共和问题(即美国联邦党人麦迪逊所谓的“扩大的共和国”),一直到美国建立联邦制才真正予以解决。相比之下,罗马也没有解决这个难题,因为那时还没有发现海洋,仅凭陆地无法解决这一问题。相关的详细研究,参林国基,《〈联邦党人文集〉释义:一项古希腊四元素的解释》,前揭。

③ 汉米尔顿等,《联邦党人文集》,第 28 篇。

战争(包括内战和外战)这一最大的“运气和强力”的危险之中。^①然而,自从新的美国联邦宪法于1787年10月份与美国公众见面并提交各邦表决,关于它的争论就不绝于耳,其中最具争议的问题就是宪法赋予全国政府尤其是总统的无限战争权问题。在那些执着于个人权利和自由以及州主权的反联邦党人眼里,联邦党人都是些迷恋光荣和伟大的军国主义者(militarists),而其中最为敏感的问题就是设立常备军问题。

由于孤悬海外,与大陆国家没有陆地边境互相接壤,使得盎格鲁-萨克逊人养成了一种根深蒂固的传统或者说偏见,即常备军建制(主要指的是陆军,海军例外)对于自由的民政是一种永恒的威胁。在他们眼里,常备军是“罪恶的温床”、“专制的发动机”、“旧世界的天谴”。遵循海洋国家的地理政治传统,他们更青睐民兵(militia)在保家卫国中的作用。在他们看来,常备军乃是大陆国家的土特产,正是由于其“致命的影响”,“地球上八分之七的曾经自由的民族”陷入了“奴役”。他们担心,美国的民主政体最终会在常备军这块暗礁上覆灭。^②因为,在所谓有限的民主政体中设置一个如此无限的权力在他们看来是极为危险的。他们宁愿把有限中的无限作为一种神秘的经院命题,供茶余饭后进行智力的消遣,而不愿把它作为一种自己必须面对的生死攸关的政治问题而予以严肃对待。

如果观察一下参与讨论和制定美国联邦宪法的那批政治精英的背景,我们不难发现,他们中的很多人是军人出身,战争是他们踏入美国政治舞台的最初历练,而这种历练使得这些和平的保卫者们成为一个政体优劣的最佳裁判者。在他们看来,邦联在应对战争方面的软弱和无能是当时美国面临的重大问题,也是他们向制宪权进行呼吁的唯一动机。因为,正如托克维尔所说的,战争是衡量一个政体优劣的可

① 汉米尔顿等,《联邦党人文集》,第15篇。

② 参 Richard H. Kohn,《鹰与剑:联邦党人与美国军事建制的创造(1783-1802)》(Eagle and Sword: the Federalists and the Creation of the Military Establishemnt in America, 1783-1802), the Free Press, 1975。

靠指南。^① 在那批美国的建国者中,颇为引人瞩目的就是亚历山大·汉米尔顿将军。从少年时期,汉米尔顿即对战争充满了憧憬和向往,22岁时被华盛顿将军招入麾下,成为其最得力的助手,几乎参与了独立战争期间所有的军事行动,被视为美国的恺撒^②。然而,战争的实际历练并非是其唯一的成就,他还积极参与了战争之后的建国行动。他既是一个战士,也是一个立法者,前者在于破,后者在于立。在《联邦党人文集》85篇文章中,他更是贡献了半数的篇幅,而且基本上都与战争的思考有关,是整部文集的灵魂和基石。正是这位手执剑柄的将军提出了著名的美国问题和美国例外论。^③

《联邦党人文集》的前半部分向美国公众反复传递了这样一个信息:邦联处于霍布斯式的自然状态的可怕局面和前景中,战争(包括外战和内战)时刻威胁着美国的生存,新大陆随时有可能堕入无政府

① 参本书4页注②。关于战争与政体(Military - civil)之间的关系的研究,德语学界以汉斯·德尔布鲁克(Hans Delbruck, 1848 - 1929)的《政治史范围中的战争艺术史》(Geschichte der Kriegskunst im Rahmen der Politische Geschichte, Berlin, G. Stilke, 1900 - 1936)(共四大卷)最为有名,已经有多个英译本。英语学界则是几十年来一再修订出版的《现代战略家:从马基雅维利到希特勒》(Makers of Modern Strategy: Military Thought From Machiavelli to Hitler), Edward Mead Earle 编,普林斯顿大学出版社,1943年。

② 但他本人对此不以为然,他宁可将自己称为帕布利乌斯。他认为恺撒并没有解决罗马政制的最大难题,即如何协调共和与帝国这两种似乎是互为水火(水元素与火元素在美国政体中获得了首次纯粹的和解,参本书23页注①)的统治原则,并将其统为一体。在《联邦党人文集》的第一篇第一段里,汉米尔顿提出了所谓的美国问题以及美国例外论,彰显了超越罗马帝国的野心,即建立一个共和的帝国,这个帝国将植根于公民的“深思熟虑和自由选择”或者说人民的“同意”这一基础之上。在联邦党人看来,在美国之前,历史上所有曾经冠以“共和”之名的政体皆是徒有虚名,与真正的共和国不是一回事,它们毫无例外地建立在对内阶级斗争,对外军事征服的陆地性贵族制统治原则之上,遭受着“运气和强力”的随意摆布。他们认为,真正的共和国应该建立在人民的“同意”这个“一切合法权力的洁净的原始的源泉”基础之上,实现真正的政治和解和政治联合。参《联邦党人文集》第1篇,第22篇,第39篇,第49篇,等等。参 Karl - Friedrich Walling, 《共和的帝国》(Republican Empire: Hamilton on War and Free Government), University Press of Kansas, 1999年。

③ 汉密尔顿的军事、经济和政治思想对游历美国的德国人李斯特影响深巨,直接促使后者写出了《政治经济学的国民体系》一书,这本书奠定了俾斯麦统一德国的帝国霸业。参 Edward Mead Earle 编,《现代战略家:从马基雅维利到希特勒》(Makers of Modern Strategy: Military Thought From Machiavelli to Hitler), 普林斯顿大学出版社,1971年,页117 - 154。

状态的危险之中。从文集的结构进行分析,关于外战的集中论述(第三篇至第五篇)被置于内战之前,似乎在暗示,外敌之于国家的生存乃是首要的威胁,也是各邦联合的最持久和深刻的驱动力。之所以在对外战争上着墨不多,似乎在暗示,国与国之间永远处于无政府的战争状态,这本身就是个常识,不需作过多解释。因为,从第六篇开始,论述开始转向“另外一些也许更加惊人的威胁,这些威胁多半来自各邦之间的纠纷,来自国内的派别斗争和动乱”。这个颇为直率和露骨的断言似乎是说,如果说外战是邦联面临的长远和永恒的威胁,内战的威胁也许是最迫切的。如果考虑到在邦联的体制下,各个邦乃是独立的主权国家,那么,联邦党人似乎在暗示,如果不将它们置于一个统一的主权政府之下,新大陆迟早会像旧大陆一样,堕入各个主权国家彼此交战的无政府状态之中,内战由此演化为外战。届时,各个邦国之间为防止彼此的侵略,势必纷纷效仿那些陷入军事暴政的欧陆国家,将本来具有统一和联合之地理特征的新大陆人为地封疆立界,各自建立起庞大的常备军(陆军),陈兵百万于各自的疆界,时刻准备着或进行着侵略和反侵略的战争。

为此,联邦党人首先考察了战争的起因。关于战争的起因,修昔底德及其《伯罗奔尼撒战争史》似乎永远是后人不断回溯的源头。遵循修昔底德的分析,杰伊认为,国与国之间之所以发生战争,既有真实和正当的原因,也有虚假的和不正当的原因。^①在真实和正当的战争理由中,大致说来,多半是由于违犯条约和国际法以及直接侵犯对方引起的。杰伊认为,在一个统一的全国政府控制之下,联邦各州就更便于协调行动,而且其行动也更加冷静、审慎和理性,从而能够最大限度地避免战争。即使是偶尔给其他国家造成了正当的战争理由,一个团结起来的强国提出的道歉、解释和赔偿,也更有可能被对方谅解和接受,从而避免战争的风险。在杰伊看来,由联邦宪法结为一体的美国能够获得更多的外交实力和斡旋的空间,从而避免战争,保持和平。而且,基于海岛国家所特有的对盟友和盟约的高度不信任,他甚至认

^① 汉米尔顿等,《联邦党人文集》,第3篇。

为,战争深深地植根于人性之中,条约和国际法有时根本没有约束力,尽管你千方百计想避免战争,但战争却会主动找上门来。

不管这是人性的多大耻辱,一般国家每当预料到战争有利可图时,总是要制造战争的。渴望军事上的荣誉,报复私仇,野心,或者为了履行能加强或帮助自己家族或同党的私人盟约。这些动机以及其他各种各样只有首脑人物才会受到影响的动机,往往使他进行不符合人民的愿望和利益的非正义战争。

他进而认为,“战争的动机可能起因于这些情况,也可能起因于目前还不很明显的其他情况。他们还知道,当这种动机起作用的时机到来时,不愁没有进行掩饰和辩解的托辞”。^①因此,联合和一个有效的全国政府可以使美国人处于和保持在一种不致引起战争从而有助于制止和阻碍战争的状态。

联邦党人认为,对于任何一个问题的讨论和思考,都需要借助常识发现其中的基本真理或首要原理,然后把它作为以后所有推论的根据。在几何学中是这样,在政治学中同样如此。例如,没有原因就不能有结果,手段应当与目的相称,每种权力应当与其对象相称,注定要影响一种自身不能进行限制的权力的权力,也应不受限制。这些原理在根本上源于常识,且为其自然和纯朴所支配,以致它们以几乎同样不可抗拒的力量和信念唤起健全而无偏见的人们的同意。否则,必然是由于知觉器官的某些缺点或失常,或者由于某些强烈的兴趣、情感或偏见的影响。^②联邦党人认为,政治学中的最大常识和首要原理应该是安全原则,既要防范外国军队和势力的威胁,也要保证防御由于国内原因而出现的同样威胁。^③然而,

① 汉米尔顿等,《联邦党人文集》,第4篇。

② 汉米尔顿等,《联邦党人文集》,第31篇。

③ 汉米尔顿等,《联邦党人文集》,第3篇。